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文学批评的发展,传统意义上作品与评论之间的依附关系有了重要改变。文学批评不再是文学作品的附属产物,而是基于文学作品,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体系和限定域的文学现象。经历这样一个“批评的世纪”,文学批评的概念本身有了进一步深入:批评不再局限于作品内容和人物形象,而是挖掘作品所隐含的人类共同心理、语言范式、文化现象和政治权威。概念的深入也带来了文学批评限定域的拓展,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语言、宗教、性别等诸多方面都开始在文学批评领域显示它们各自的影响。但是,文学批评所带来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文学批评能否在上述领域内保持它的有效性,体现出批评对于文本和文学现象整体、全面的阐释呢?

从实际状况而言,上述命题可能还只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假设。伴随着文学批评的独立,一方面它在自己的丰富性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众多概念的加入和影响也制约了文学批评本身。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越来越多文学之外的概念加入,导致其往往偏离文本审美的初衷,许多文学批评徒有“文学”之名,远远超出文学之外。20世纪中期“泛政治化”文学批评,便是其情其境的真实写照。二是文学批评概念本身的深入,也衍生出了许多阻碍其有效性的因素,如语言范式、文化传播、受众心理等,在文学批评自主性不强时影响自然有限,然而在当今却无时无刻不对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产生干扰。可见,尽管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有了质的飞跃,其影响力超越了以往任何时候;但它所受到的内外两方面的限制,似乎并没有减少。想要真正确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当务之急应是突破上述限制,而探索和建构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不失为很好的解决途径。关于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历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恐怕最纯粹的本质论者也无法有根本性答案。既然如此,不妨换一种思路思考问题:在何种处境下,我们与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呢?倘若我们能对此做出回答,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对背离文学批评之自由精神处境的某种超越,也许不失为对探寻文学自由精神和实现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一种阶段性解释。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与自由精神

□余一力

与文学批评自由精神相悖的处境,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活在话语的压迫中。话语,可以是代表政治上极权统治伴随的垄断话语,可以是为经济利益将文学批评物化为某种商业手段,它同样可以是某些特殊经历(如从军、入狱、逃亡等)对文学批评者内心的影响。以至于当他们对作品进行文学批评时,代表这些影响的声音不由自主地跳出来与批评者激烈辩论,甚至压倒批评者的真实愿望。话语的压迫意味着某些话语模式对文学批评的统治。无论批评者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他们都无可避免使用固定的话语模式。在这种处境下,文学批评只能发出话语模式所允许的声音;因此,我们不难看到批评家们会针对特定作品做出千一律的解读和评论。无论是古代解读《诗经》中“关关雎鸠”时生搬硬套的“后妃之德”,还是近代把英国湖畔诗派理解成“保守”、“反动”的象征,都是这种固定话语模式下批评家们闹出的笑话。在这种众口同声的语境中,文学批评本身都成为这些话语的工具,丧失了对文本和文学现象做出阐释和评论的能力。所谓自由精神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了。

二是活在“历史”的童话里。国人很重历史,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是也。然而无论是祖辈口述的故事传奇,还是竹简纸帛的二十四史,它们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的,都是讲述者站在他的视角进行选择与记录的。历史的最大缺点在于它总是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反复建构,而在这种重复之中,事件本身的真相及对于当代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则被选择性地忽略了。假如文学批评建立在讲述者的历史中,把建构当做理所当然的真实,甚至是不证自明的公理,那么与历史联系紧密的文学批评就只能是对建构的一再重复。女权主

义批评者早已明确指出,整个文学史其实是男性/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史,女性总是被书写、被制造和被歪曲的。今天虽然已经逐步认可这一挑战“历史童话”的观点,但在国内学者对于神话的研究中,划分西方女神形象时也还是想当然地按照从来如此的男性对女性的选择标准,把女神分为“天使”、“妖妇”两个大类。那些神话中的女英雄、女领袖、女勇士们,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埋没在了历史的阴影之下。诸如此类的“想当然”、“习惯如此”的观点在文学批评中比比皆是。所以,在“历史童话”中的文学批评,虽然不再是话语的工具但仍处在深层次的意识束缚中,难以表达文学文本的全部特征和批评者的真实想法,因而不能被认为是代表了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

三是活在身份的圈套中。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身份的圈套日益成为文学批评的又一桎梏。所谓身份的圈套,乃是批评者对于某种身份的认同,从而在文学批评中不自觉地作出符合身份和社交圈子的选择。每一个人似乎都生活在不同的身份之中,我们不由自主接受这些身份,除了身份本身可能的物质利益外,更重要的是迷恋身份带来的认同感。尤其是在一个现代文明解构传统崇高的时代里,“我是谁”的问题困扰着现世中的大多数,我们生活在物质的沃土和精神的僻壤之中,自我存在感的极度匮乏让身份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安全标志。有了身份,才有了自我认识和自我价值的存在。因此,我们怎能不终身趋之如鹜,不由自主地接受身份为我们规定的内容和方式。例如大学教授们往往对于流行于网络的通俗小说不屑一顾,而民间作家对于所谓格调、风雅也经常嗤之以鼻。在这种心态之下,文学批评也就顺其自然地陷入身份圈套中不可自拔。在圈套中,我们未必完全没有自由精神,但是它的

存在削弱了我们思考的能力和意识,限制了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全面性,让自由与真实永远隔着一层距离。

与文学批评自由精神相悖的三种处境,之所以被称为处境而不是“困境”,是因为我们既难以认识到自己受限于中,也无主动摆脱、寻求自由精神的动力。批评家在努力摆脱上述处境时,不可避免会遭遇话语压迫者的强大压力,甚至陷入主动失语的痛苦中;同时还要无时无刻和自己在已建构的历史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斗争,更要在打破身份圈套时敢于面对身份缺位的迷失。显然,针锋相对地直面这三种处境,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将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即使能够承受,也无法保障出现反向异化。因此,抗争和摆脱处境的策略选择就极为重要:首先,文学批评家应当在逆境中培养思维和逻辑辨析能力。在已知的能够用逻辑准确定义的话语模式和历史童话中,文学批评家的第一要务是以自己的努力完善自身的逻辑性。当批评家单纯地服从话语压迫和历史童话,自由精神当然无法立足。但如若这种服从包含有衷地为其中蕴含的逻辑所折服,那么随着批评者逻辑演绎能力的进步与发展,终有一天批评者能发觉不是所有的话语模式和历史童话都可以合理推演——质疑自然开始,文学批评也将就此远离奴役之路。其次,在质疑发生时,文学批评需要以反讽而不是反对的态度面对这些自由精神的桎梏。还是以性别二元对立为例,单纯提倡“打破男权,绝对平等”,把男性作为斗争的对象,无益于对立的消解,还会招致持有不同观点的女性本身的误解和排斥;倘若摆脱桎梏的策略是在书写中改变男性在话语中的地位,以男性中心话语模式建构女性中心话语,在这种巨大的对比和反差

下,身份圈套的荒谬对于相当部分的读者而言不言自明,有助于更多的参与者不再自觉地踏入身份圈套的状态;这样,才能实现打破二元对立的第一步。

当然,并非摆脱这三种处境,文学批评自由精神就会如约而至。处境是否能被摆脱,逻辑和反讽是不是在建构新的桎梏,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摆脱的意义在于,文学批评者能够以更为全面、更少受到过往的历史和当下的环境影响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已有的文学问题和现象,并为之后可能出现在文学文本和文化生活中的类型情形提供有益的参照,这一参照与建构历史“童话”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它提供的是一个帮助全方位思考问题的体系和一种敢于怀疑、善于怀疑、怀疑之后解决问题的立场。后来者可以根据这种思路和立场重新建立与他们时代的价值观念相适应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不必受限于当下文学批评所运用的语言,拷贝的历史观念和习惯的身份立场。同时,对于已有的结论,文学批评也可以借此来进行新的思考和认识。例如《简·爱》的后殖民解读,便是打破惯例与模式的新成果。

必须认识到,“自由”本身并不直接走向“有效”。即使具备了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依然需要文学批评者为之付出心血。但是,追求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是摆脱外在因素对文学批评本身所造成的不易察觉之影响,实现文学批评有效性的可能途径,而在这条道路上,文学批评会有所收获,也必然面临某种失落。就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走出了梦幻的美好和真实的欺骗并存的家,不再依赖海尔茂而是勇敢地独自面对世界;而艾丽达却选择了放弃象征大海和未知的陌生人,留在了房格尔身边继续普通人的生活——她们共同秉承的信念便是“自由选择、自己负责”,亦可以成为文学批评者们应具备的原则。毕竟,无论是文学批评的自由精神,还是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总不会原地不动就可以期待的吧。

如何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9)

文学需要飞翔

□石 厉

近期有人强调文学应贴近心灵与现实,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古典文学自不用说,从西方现代主义、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都不会诞生在真空中,也不会凭空想象,即使是历史文学、童话、寓言或科幻等文学样式,不管它们的情节多么离奇,也都呈现出心灵与现实的观照背景。不同的心灵背景和现实背景中所产生的文学形式都有不同,先秦有楚辞、汉有赋、六朝有骈文、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这也是王国维所认为的一代皆有一代之文学的深层原因。文学是在心灵、现实的土壤上产生的,但是成功的文学作品都不会沉入到心灵与现实中止步不前,都会以讽喻、象征或批判的方式,对自身所处的心灵环境与现实环境进行独特的反思。因此面对心灵与现实,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所贴近或反思的对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灵与现实?因为创作者自我的心灵也好、他人的心灵也好,心灵永远都是一个谜语一样的东西,谜有谜底,但是心灵却没有谜底。以前认为上帝是心灵的谜底,但是自从“上帝死了”以后,人们的心灵就像泛滥的河流,不仅随处拐弯抹角,而且四处奔流,你根本无法紧随其后,不但常常给别人造成灾难,给自己也造成灾难。而现实呢?不乏为了物质利益而战天斗地的名利场。在这种情形下,理论家感到一种压抑和苦闷,重申文学要贴近心灵、贴近现实,这种重申如果仍然让文学、让作者也让读者在心灵与现实的迷阵中无法自拔,那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试图要寻找让心灵透气的窗口,是试图找到像陶渊明《桃花源记》那样既入世又出世的现实,那是文学的幸运能不能实现呢?我认为还是需要限定,那就是在文学的前提下可以实现,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完全可以实现,那些许许多优秀而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例证。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文学的意义。文学就是给人一种理想,给人一种继续寻找的力量,给人一种永远的感动与冲动,不管结局如何,人们却永不放弃,用哲学家尼采著名的概括来说,文学的精神就是“酒神精神”。在尼采的阐释中,“酒神精神”是悲剧精神的本质,是人类伟大精神的见证。这种精神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是对于复杂现实与人类狭隘心灵的一种超越,对悲观结局的一种超越。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的心灵越来越曲折,现实也越来越复杂。文学中主体所面临的心灵与现实这个客体,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才具有广阔的前景和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才具有广阔的前景和自由。

已今非昔比。这也是《黄帝内经》中黄帝与岐伯论道时反复指出的人心与现实都不古的事实。人的心灵并非古典主义时代那样简单、朴素,现实也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理想与纯净,心灵也可能是伪心灵,现实也可能是伪现实,或者说现实与心灵越来越不是自己所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子。人所在的现实与心灵被扭曲、异化的现象,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明确指出过。因而只靠单一的反映或贴近,文学也无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文学。事实上任何一个由人群组成的社会,都不存在一个理想的现实与理想的心灵。海涅在1824年写的小诗《世界和人生太残缺不全》中直接叫喊:“世界和人生太残缺不全,我要请教德国的教授去!”他有的是拼凑人生的本领,能搞出个明白易懂的体系。他还会修修补宇宙结构的窟窿,用他的睡帽和破睡衣。”(杨武能译)这首诗歌反讽了教书匠对残缺不全的世界和人生所故意进行的掩饰,理性的虚假的掩饰让诗人生厌。我记得舒婷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我要求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舒婷的这首诗歌曾经让人的内心发生过震撼。在舒婷富有象征含义的语汇中,之所以要求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那是由于天空可能不纯洁、道路可能不正直。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将现代社会的人类比做一窝蚂蚁,人就像蚂蚁一样被本能的欲望控制着,也就是被无穷的物质利益所驱使,这就是人类真实的心灵和欲望。他认为人类理想的心灵则是超越物质利益而指向精神层面的,是对于自由的向往。他的小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其中主人公所有的行为与心理都是围绕这样一条心灵悖论式的存在而展开。他在《略谈乔治·桑》一文中指出:“她的信念、希望和理想,都建立在人的道德感,人类的精神需求,人类对于完善、纯洁的憧憬上,而不是建立在蚂蚁的欲望上。……即承认个人及个人的自由(因此也承认个人的责任)。由此并承认义务以及对于履行义务所需要的严格的责任。”这既是在谈论他自己的小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有了受物质利益驱使的心灵本能,也就有了追逐物质利益的纷繁现实,文学的责任就是要试图超越这种人类受本能驱使的心灵和在利益追逐中形成的现实,从而为人类的心灵建立一种信念和理想,这种信念和理想并不是空泛的,是建立在道德与责任基础上的人的自由,或者是对于自由的追求。没有这样的理想,人类的心灵是空泛的、茫然的甚至是罪恶的,所以他笔下那些被痛苦煎熬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由于利欲所致。利欲让人陷入罪恶的牢狱不得自由,幸福平静的人生需要超越人本能的欲望。而建立在道德、正义和他人幸福基础之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才具有广阔的前景和自由。

空间。

另外,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能动的参与者是作家这个主体。作家除了要描写心灵与现实这样一个客体外,随时还要反观主体自身,也就是说作为现实存在与心灵所在的主体,同时要反观或面对自己所在的现实与心灵。在这种反观中,常常会走样,正如古诗所吟诵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者在感知自己所在的现实与心灵时,由于主体本身对客体认知过程的绝对干扰,很可能使这样一个过程发生偏离,从而出现量子力学中所说的“测不准”现象。所谓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是指测量工具本身对测量对象的影响导致所有的测量结果都要发生偏差。而丈量人生不全,我要请教德国的教授去!他有的是拼凑人生的本领,能搞出个明白易懂的体系。他还会修修补宇宙结构的窟窿,用他的睡帽和破睡衣。”(杨武能译)这首诗歌反讽了教书匠对残缺不全的世界和人生所故意进行的掩饰,理性的虚假的掩饰让诗人生厌。我记得舒婷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我要求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舒婷的这首诗歌曾经让人的内心发生过震撼。在舒婷富有象征含义的语汇中,之所以要求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那是由于天空可能不纯洁、道路可能不正直。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将现代社会的人类比做一窝蚂蚁,人就像蚂蚁一样被本能的欲望控制着,也就是被无穷的物质利益所驱使,这就是人类真实的心灵和欲望。他认为人类理想的心灵则是超越物质利益而指向精神层面的,是对于自由的向往。他的小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其中主人公所有的行为与心理都是围绕这样一条心灵悖论式的存在而展开。他在《略谈乔治·桑》一文中指出:“她的信念、希望和理想,都建立在人的道德感,人类的精神需求,人类对于完善、纯洁的憧憬上,而不是建立在蚂蚁的欲望上。……即承认个人及个人的自由(因此也承认个人的责任)。由此并承认义务以及对于履行义务所需要的严格的责任。”这既是在谈论他自己的小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有了受物质利益驱使的心灵本能,也就有了追逐物质利益的纷繁现实,文学的责任就是要试图超越这种人类受本能驱使的心灵和在利益追逐中形成的现实,从而为人类的心灵建立一种信念和理想,这种信念和理想并不是空泛的,是建立在道德与责任基础上的人的自由,或者是对于自由的追求。没有这样的理想,人类的心灵是空泛的、茫然的甚至是罪恶的,所以他笔下那些被痛苦煎熬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由于利欲所致。利欲让人陷入罪恶的牢狱不得自由,幸福平静的人生需要超越人本能的欲望。而建立在道德、正义和他人幸福基础之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才具有广阔的前景和自由。

文学的创作者,仅贴近心灵与贴近现实的写作,还远远不够,只有在对心灵与现实的不断感知中,最终超越心灵本能的狭隘和局限,超越现实中的功利和障碍,人类才能凭借文学体会到更加自由理想的境界,主体才能在对客体的感知中,最终获得精神的自由与解放,文学才能够意义无限。不然,那种出自动物的利欲本能、虽然是写实但却是功利的、堕落的文学,呈现给人类的只能是心灵的无底深渊和现实的泥潭。

洞察

书评

新世纪新诗研究的收获

□胡亚楠

张德明的新著《新诗话·21世纪诗歌初论(2000—2010)》(以下简称《新诗话》新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是一部研究中国新世纪诗歌的专著,为我们较清晰地呈现了21世纪初新诗创作的概貌。《新诗话》呈现了如下显著特点:

首先,作者采用的“新诗话”批评方法,重启了古代传统的“诗话”的叙述策略,是对当下分析性陈述、逻辑性阐发的诗歌批评方式的一种超越。“诗话”是中国传统的诗学形式,其理论特点就在于它既考虑到了诗人创作作品时的具体语境和心灵状态,也融入了批评者自己的生命感受,使得诗歌批评始终饱含着批评主体的鲜活的体验与情味。张德明摒弃了一味追求理论阐释的所谓科学性和客观性,从“知人论世”的诗学观念入手,采用春秋笔法,秉承感悟诗学,以一种富于开放性、对话性、趣味性、重直观印象的话语表达模式,勾画出一道道新世纪诗歌的美学景观和精神图谱。比如,第一章分析“黄礼孩现象”,为我们展现了一位“散发着亲和与热情气息”的诗人,凸显了黄礼孩“和善”的心灵特质,认为正是诗人所具有的“和善”的心灵品质才写出了“满是光亮,体现出人间的精神力量”的诗歌作品,并由此得出“和善”是黄礼孩在当代诗坛上显现自己独特性的重要标志。

其次,全书脉络清晰,结构谨严,层次分明,开合有致。作者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在结构层面上分为“现象论”“地域论”“诗群论”“结构论”“本体论”五章。第一章“现象论”,他讨论了诗歌创作与诗坛现象的关系,列举当代诗坛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如李少君的“自然之思”、“主编诗人现象”等。第二章“地域论”,从诗人与地域的角度立论,选取以陈先发为代表的七位诗人进行了论说。第三章“诗群论”,对诸如“中间代”“下半身写作”等诗群进行评说。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是“结构论”和“本体论”,是从诗歌的形式本体与内部世界来评述的。具体来看,既有对新世纪诗歌创作取得卓越成果的诗人的仔细考察,又有对本时期诗歌创作的整体概述;注意章节之间的呼应与贯通。比如《新诗话》中的“现象论”和“诗群论”,前者是对具有典型意义的诗人的具体评析,是诠释诗歌文本与诗人个体之间的关系,如安琪的“中间代”,潘洗尘的“艺术耕夫”形象等;而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在后来的章节中也点明了诗歌文本与诗人所处流派的关系,从而将“现象论”与“诗群论”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可以看出,作者在结构安排上颇费了一番心思。

第三,注重对诗学理论问题的探究。比如,在“结构论”中的第一节,张德明提出了“张力”这个概念,将“张力”细化为意象张力、形式张力、节奏张力等。他认为,意境主要是古代诗歌所追求的艺术效果,而新诗则力求张力的生成,在中国诗歌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诗歌所追求的审美特点是不一样的,“现代诗的张力美学”对应着现代人生的多变和心灵的繁复等历史情态。又如,在第二章“地域论”中,作者关注了诗人与地理两者之间的隐性联系,丰富了诗歌批评的范围。张德明在文中指出,特定的地理环境是诗人观察世界和自我的最初立足点,同时也赋予了诗人特定的文化气质。比如,作者从地理学的角度评析陈先发的诗歌创作,不仅发掘出陈先发与桐城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呈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诗人“陈先发”的形象。

《新诗话》是对于当下偏重于学理气的中国新诗批评的一次新突破,自然也是新世纪新诗研究不可多得的一个收获。

文化惠民是生活的幸福源

在图书馆、博物馆等建设指标上,东莞均实现了全民覆盖……国家级媒体盛赞:东莞图书馆办得像米店一样多。(《东莞时报》2012年1月11日)当市民和读者成为文化消费者和受益者之后,文化消费需求一下子被激活和释放了,相信在这个城市将逐渐形成文化新风气,东莞居民产生了一种幸福感:只要想看书就可以去图书馆,这是值得骄傲的。对于爱阅读学习的人来说,东莞市图书馆是一个很惬意的去处。在这个“图书馆”连锁的城市里,许多人有了文化的自觉,更多地考虑精神文化享受、娱乐、教育、旅游、收藏、赏画、看戏等文化消费在东莞人生活中的消费支出,不断提高。图书馆打开读者的视野,文化打开一个城市的未来,东莞公共服务体系的逐步完善就是“文化惠民”,在看到图书馆这个文化“硬”条件后,我们更要关注文化的“软”服务要怎么惠民,恰恰是软硬结合、良性循环,文化才能接“地气”使这个城市文化底气十足。在这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生存的压力下,我们少有条件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的业余生活基本是睡觉和挂QQ,精神生活匮乏,文化生活饥渴。对于这个群体,我们社会需要更多呵护,要与之共享公共资源,帮助更多人融入东莞,平等乐享公共文化服务成果。

甘应鑫(广东)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wybdzhehainxin@sina.com

中山文学院 图书出版征稿

由中山文学院、南京远东书局有限公司组编的《中国作家文集》《远东书林》《当代艺术家精品集(某某卷)》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质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个人文学、理论专著以及书画、摄影等艺术作品均可出版。使用国内出版社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图书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孙建国。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周期为四十至九十个工作日。

三、编辑部会将出版的作品,安排在《文学报》或《小说选刊》等报刊发布书讯。敬请关注。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十多年来,出版的正版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出版后,将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个人专著者请联系:

21106南京市江宁区胜太路77号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信箱:zs8588@126.com;QQ:856488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

葵町文学

2012年第四期(